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刘 海 峰

[摘 要]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关键词] 科举;科举学;八股文;试帖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2-0176-07

科举是隋唐至明清中国制度的主干和文化基因之一,与社会政治、教育、文学、风俗、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就文学方面而言,科举与文学有不解之缘。科举是一种文官考试,但从考试内容和考试文体来看,科举却是一种文学考试或经学考试,近代不少西方人便将科举称之为“文学考试”或“文士考试”,获得的是“文学学位”。1300年间,不仅多数文学家是科第出身,而且科举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方面面。本文由界定“科举文学”概念切入,分析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探讨科举与文学各方面的关系,并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作简要论述。

一、“科举文学”释义

何谓“科举文学”?科举文学是指因科举考试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和体裁及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它包括“科文”及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前者如试帖诗、策、论、律赋、表、判、诰、箴、铭、八股文等等,后者如唐人行卷等,内容涉及科举的唐诗、传奇小说、宋元戏曲话本、明清小说,还有现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等等。有学者认为,那些受考试制度间接影响及与之产生各种联系的文学,也可以纳入“科举文学”范畴。如平时为应考所作的“习作”,举子间所进行的“私试”,反映个人或群体围绕科举所展开的社会人生及其相关思想感情的作品,都是“科举文学”应予关注的对象^①。

“科文”即“科举之文”,是指在科场考试中产生的各类文体和文章。《元史》卷81《选举志》载: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下诏恢复科举,规定:“乡选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腹里宣慰司及各路关申礼部,拘该监察御史、廉访司,依上录连科文申台,转呈都省,以凭照勘。”这里所说的“科文”,便是指科举考试中的答卷文章。

与中国类似,韩国科举史上也有“科文”的概念。李朝英祖五十一年(1775年),赵思忠奏启:“每当岁首,令八道各邑,择其有文学士生进,荫官之外,随多少抄报于监营,试之以科文杂体,明其有文,然后录名成册,以为赴举之制。”^[1](卷188《选举考五·科制五》)所谓“科文杂体”,是指科举考试的各种文体。韩国学者李炳赫有专文研究韩国科文的种类、形式、出题倾向及科文的文学意义。

以往中国文学界受制于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不重视科举文学尤其是“科文”研究。事实上,中国古代“文”的概念内涵复杂而丰富,科举文学更是西方文学中所没有的题材和元素。研究者不应完全用西方

文学的眼光和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应有一种文化自觉和反省。近年来,学界开始重视对“科文”或考试文体的研究。邝健行认为,考试文体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写作的目的性很强;二,写作时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和限制;三,文体种类繁多。考试文体的作者虽是被动写作,是“为文而造情”,但其作品并非全无文学价值。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科举文学研究的内容除了“科文”以外,还应包括与科举直接相关的文学作品和人物,如科举出身的文学家或文学家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文人因备考科举的结社、某一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等。

二、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

就具体的考试文体而言,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均与科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试从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曲、才子佳人小说五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

(一)试帖诗与律赋

唐代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以首场诗、赋最重要。诗一般为五言八韵,通常称为试帖诗。赋为讲究声律对偶、重视声音协调、通常为八韵且以四六句式为主,又称律赋。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这一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业诗攻赋之人,是唐代诗赋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爽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一方面,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促使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另一方面,在以诗赋取士的背景下,诗歌成为仕进的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又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灌于诗的创作,由此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促进唐诗的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以诗取士之风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正因唐代进士科以五言八韵律诗为式,才促使人们努力钻研写作技巧,平时注意收集素材和写作诗歌。当一般读书人都懂得作诗的基本知识以后,诗歌创作必然成为普及之事。况且,省试诗的目的是考察举子对作诗技巧的掌握程度,并不苛求写出传世名篇。在考场按命题仓促成诗,一般不易写出上佳之作,祖咏《雪霁望终南诗》和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算是例外。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省试诗的文学价值虽比不上平日的推敲之作,但若将此类诗作排除在外,《全唐诗》的规模势必大为减少。归结来看,说科举制度促成了唐诗的兴盛和唐宋文学的繁荣并不为过。

元明两代科举不试诗赋,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是文学色彩相对较弱的时期。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科试罢论、表、判,增试五言八韵律诗,重又掀起了选评唐人试帖诗的热潮,由此产生了大量选本,发表了不少有意义的见解,形成了清盛期诗坛的一道独特景观^[2](第27页)。科场试诗推动了整个文学界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讨论,是清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清代科举童生试以赋出题,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清代赋尤其是律赋的兴盛。

(二)策论

策是在科举考试的各种文体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从汉武帝开创制举以后,对策就成为一种主要的考试文体,为历代所沿用,即使是在唐代进士科试诗赋和明清以八股文取士的时代,对策仍是非常重要的考试内容。策问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之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有学者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各科目几乎无不试策,而且几乎都把试策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有很多科目甚至将试策作为唯一的试项,“因而试策也是承担唐代科举精神实质及其职责功能最为得力的试项”,与其说唐代科举是“以诗取士”,倒不如说是“以策取士”^[3](第3页)。

策文包含了策问与对策两个方面。策问是命题者提出问题,对策则是考生回答问题。有时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为不易,有时提出问题本身即接近于找到答案,而如何提出问题往往也很能体现出题者的思想水平和文学功底。中央一级考试的策问命题者有时是皇帝本人,更多时候是才思敏捷的清要官代拟,因此发问者的水平比多数对策者的水平更高。曾经主持过省试或会试,对大臣而言也是光荣而重要的经历,因此他们通常也会将自己设计出的策问视为得意之作。鉴于此,有学者认为,策问本身也是文章。策问不仅发“问”,往往是以“论”带“问”,甚至是以“论”为主,篇末见“问”,其“论”的本身也是一篇短小的论文。古代文章家都非常重视策文,从《文选》开始,就把策问与对策列入严格的“文”的范围,直到清代,历代许多文章选家或作家本人都把策问与对策作为文章收录在文集中^[4](第92-111页)。

论与策基本上属于同一类考试题型,均须根据给定的题义铺陈己见,因此往往将策论并提。策的题型大体相当于现代各类考试中的问答题,论则相当于议论文。论是一种历史悠久、用途广泛、极具使用价值的文体,在唐玄宗时开始出现于进士科考试中,到中南唐时期,论曾作为独立的考试文体,甚至在李德裕为相时曾一度取代诗赋。发展到宋代,论在进士科考试得到广泛的重视和采用^②。唐宋博学宏词等制科考试也经常试论,宏词科之所以被称为“三篇”,就在于其考题往往是考诗、赋、议论各一。

对策的文学价值受到一些学者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受到选编状元殿试对策文的学者的赞扬。陈选公认为,策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典型的“官人文学”(或“考试文学”)、“考试文体”,它们曾给予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不比任何其他“文学”种类逊色,理应成为今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策文就像恐龙一样,曾经是古代“文学”的庞大物类和众生“主宰”,后来一夜之间完全绝灭。但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无用”部分而全盘否定和抛弃它们,而应像对待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对之进行科学的整理、研究、开发和利用。对策者通常注意在行文中体现自己的修养、气质、胸怀、风采和精神等。特别是一些状元策,如宋代的汪应辰、张九成、王十朋、文天祥,明代的罗伦、黎淳、顾鼎臣、罗元化,清代的韩荃、钮福保、孙家鼐、张謇等人的策文,均属于文情并茂、富于感染力的佳作。

(三)八股文

在所有“科文”之中,影响最大且人们评价差异最巨的是八股文。其他考试文体在平时的文学创作中都可用到,差别只是考场内按命题作文或日常有感而发进行写作。但八股文却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除了考试以外几乎一无所用,可以说是“科文”中唯一只有考试价值而很少使用价值的文体。

作八股文须兼具经术与文学两方面的才学,它的形成是明清以前科场中经术与文学矛盾互动的结果。八股文是考试制度长期实行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标准化作文考试文体。唐代科举中有墨义和帖经题,即相当于现代的简答题和填空题,但因为考不出高深水平,到宋代以后逐渐被淘汰。而作文题最能体现作者的才华,然而因属于主观试题,不同的人评卷主观误差可能很大。评卷客观化、控制评卷误差是大规模考试发展的内在要求,八股文便是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而产生的。从考试实施的层面看,八股文的特点是命题容易答题难,《四书》《五经》是题量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特别是《四书》,随便从中抽出一句话、一段话、几段话、整章,甚至半句话、一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题目,因此也不时有皇帝为会试钦定《四书》文题之事。答题则困难得多,八股文实际上是有固定的标准格式,却无固定的标准答案。命题作文题目虽同,答卷却可能千差万别。

科举时代人们常说“文有定评”,主要就是因为采用了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作八股文就像是有严格规范动作的体操比赛,比如双杠运动,限定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规定动作,越干净利落如行云流水一般连贯优美得分就越高,而自选动作越高、难、险、美越能博得裁判的好评。作八股文就是一种智力体操,在规定的程式内作有限的自由发挥,考官也易于评判优劣高下。本来作文是所有考试题型中最难客观评分的,八股文却定出特别的格式,让考官有章法可循,较可能掌握一致的评价标准。

八股文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形式主义的考试文体,非常苛求文章的严密逻辑和工整对仗。清人丁心斋说:“一篇文字如一身之体段相似,搭配须要匀称,方成一个章法。……八股文恰恰起讲是头脸,入题是咽喉项,提比是两臂双手,点题是心正面是胸腹,后股是两股两足,一处不称则一处不成局。……而其

中煞有变化,比如画法有立像有坐像有侧像,有起伏转动趋走跳舞之像,而总不离乎四肢百骸,万不能加臀于项,置股于肩。”^[5] (“炼字诀”)经过写八股文的严格训练之后,再去作其他文体,就显得较为容易。

就文学价值来说,以往有论者认为八股文是“画中之猪”,毫无美感可言,在文学史上也毫无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现代作家开始认识到八股文也自有其精妙之处,文学界为八股文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八股文是命题作文,即有学者所说的“赋得的文学”或“赋得的文体”^[6] (第387、389页),在命题作文的特定情况下,能够作出逻辑严密“花团锦簇”的文章,确需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因此,八股文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功用,它在当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有其得以沿用的内在原因。

(四) 状元戏曲

受唐宋时期榜下择婿社会风尚影响,包含男主人公科举及第情节的戏曲,往往有进士及第后当上乘龙快婿的内容,只是为了增加戏剧性,通常将现实中的公卿之家选进士变为戏曲中的皇帝钦点状元为驸马。从南宋开始,已有以科举考试中状元为题材的南戏。《赵贞女》和《王魁》是宋代南戏的代表作,被称为“戏文之首”,均记状元故事。前者记赵贞女与蔡中郎的故事,是元末《琵琶记》的祖本;后者记“桂英活捉王魁”的故事,是元人尚仲贤《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杂剧和明人王玉峰《焚香记》传奇的祖本。萧源锦认为,宋人笔记中某些有关状元的材料,成为宋代状元题材的南戏和话本的最早来源,而这些南戏和话本又影响了以后元、明、清的戏曲和小说^[7] (第343-344页)。《张协状元》中的张协为虚构的人物,该剧是现存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此剧本通过张协中状元之后贪图富贵、负心弃妻的故事,塑造了中国古代戏曲中最早的负心男子的形象。这种穷士子登科发迹、负心变德“背亲弃妇”的故事,很合乎痴心女子负心汉规律的传统婚恋主题,形成了一种戏曲模式,为后来许多戏曲所借鉴。

科举与明清戏曲也有密切关系。例如,八股文便与明清戏曲有不解之缘。包括李渔在内的许多戏曲家喜欢将戏曲与八股文类比以提高戏曲的地位,并探寻八股文与戏曲的共性,特别是在戏曲理论中借鉴八股文的章法。金圣叹对戏曲的批评,如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便广泛使用了八股文理论和术语,例如:“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8] (第17页)不难看出,金圣叹批评戏曲的术语是从“八股文美学”中领悟创造出来的。

中国民间戏剧舞台上,有关状元的戏曲可谓剧目众多,内容丰富,流传久远,影响巨大。据王政尧研究,清代民间上演的状元戏有《九才子》等31种,另有传奇状元戏《长生乐》、《太平钱》等55出,杂剧中还有状元戏13出^[9] (第354-368页)。毛佩琦主编《中国状元大典》一书,在“状元戏曲本事”中,收录以京剧为主的至今仍在演出的以状元为题材或有科举情节的剧种便达84个^[10] (第668-671页)。足见考科举中状元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经久不衰的题材。

(五) 才子佳人小说

从唐宋传奇小说开始,科举及第金榜题名成为小说长盛不衰的题材,才子佳人的情节套路一如西方文艺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模式。而所谓才子,一般就是有文章才学能高中科名的士子。隋唐以后绝大多数文学家即使未中过进士或举人,至少也参加过科举考试,冯梦龙、凌蒙初、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等人之所以会在小说中经常描写有关科举的情节,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或长或短的应举经历。明清小说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许多小说直接描述科举活动。典型者如《儒林外史》对科举考试的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描写,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资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对科举考试和秀才人物的细致描写,该书描写“科举士子”题材的小说达20多篇,从《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到蒲松龄对待科举考试尤其是对乡试考官的批判态度,同时也流露出内心对科举的向往之情,这与他个人的科举经历有关^[11] (第87-111页)。“三言”“二拍”中也有篇目如《老门生三世报恩》,便有直接描述科举考试的场景。冯梦龙、凌蒙初均科场失意,至多补为贡生。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科第的机遇,往往借笔下的男主角来寄托自己登科梦想。分析“三言”“二拍”的科举观,可以看出作者非常看重科举做官甚至是把它作为人

生中最能得到心理满足的目标,讽刺也罢,宿命也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科举有一种割不断的牵挂。可以说,明清章回小说很少有跟科举毫无关联者。

其二,盛行才子佳人小说模式。这类小说通常采用同一模式,即男才女貌,两情相悦,但或者是女方父母阻拦或者因男方太穷或遭遇变故,在矛盾冲突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子高中科名,于是与佳人的结合不再有任何的障碍,结局终于圆满。之所以在小说戏剧中会出现才子佳人模式,部分原因是由于科举确有使贫寒士子突然间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可能,而寒窗苦读一举成名的转折具有戏剧性的效果,便于铺衍情节并吸引读者和观众。可以这么说,科举使得那些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也“八股化”了^[12](第453页)。

其三是小说人物经常为科第中人。例如,“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成为科举文学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唐代进士及第就有风流平康里之风尚。《开宝元年遗事》载:“长安有平康里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唐代较著名的有《李娃传》、《霍小玉传》之类的传奇小说。此外,如《太平广记》卷二七四所载《欧阳詹》故事,同卷引《本事诗》所载《戎昱》故事及《广记》二七三引《唐阙史》所载之《杜牧》故事等,都丰富了这一母题的创作。发展到明代,便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类的白话小说故事。到清末,甚至还出现了《青楼梦》这类描写“进士与妓女”的长篇小说。

其四是在小说中大量使用科举术语。与戏曲评论中往往借用八股文章法和术语一样,时文的“章法理论”也经常出现于明清小说的描写中。如岐山左臣《女开科传》第五回中说:“今我有个譬如,譬如美女佳人,只好贮之金屋,谓之房稿可也。李童可儿正好随我四方,谓之行卷可也。如今做秀才的人,那有只读房稿,不读行卷之理。况且两榜人物,行卷内文字好的,然后想他的房稿。”情隐先生编《觉后禅》中有许多地方借用科举术语来比喻,如卷一第五回中,未央生心里思忖:“我想天下的女色,岂有有了榜眼探花,而无状元之理,毕竟有第一位的在那边,我还不曾遇着。如今看来看去,这些妇女,只好在这边做备卷。若还终久遇不着,亦可拿来塞责。”卷三第十五回中,香云“听了这话,就象科场后不中的举子,遇着新贵人一般,又惭愧又羡慕”。由一斑而窥全豹,据此可见科举术语和八股章法对小说的渗透之深^[13](第225-231页)。

三、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

科举与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隋唐至明清多数文学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几乎每位文学家的文集中都可以找到有关科举的内容,许多人将科举及第作为毕生的追求,具有浓得化不开的科第情结。对科名的向往、对科举的无奈和怨恨等情感往往充斥于文学作品之中,或者在作品的人物中寄托自己的期望、发泄自己的喜乐哀怒。无论是诗赋策论,还是戏曲小说,都有许多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部分,古代科举文献中有很大比例属于科举文学。举例来说,隋唐以后的古代文论,尤其是明清文论,离不开科举因素,如明代文论中有大量文论与八股文相关。有学者认为,科举用书的出版是明代文学选本繁荣的原因之一,科举还影响到明代文学理论,突出表现在评点批评方面,而明代文学流派众多,也与科举风尚相互影响。因此,科举文学已成为“科举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虽然汇聚成“学”只是近十来年的事,但其研究历史却有上千年之久。“科举学”是科举时代的固有词汇,古代“科举学”即“科举之学”,通常指的是如何登科的学业或学问;当代的“科举学”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学科或学问,是类似于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它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相关的一门学问。

从文学视角研究科举与从科举角度研究文学,都会有新收获。研究科举制度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了解,从“科举学”视角研究文学是一个宽广的领域,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反之,大量反映科举活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个案人物的科举经历和体验的细节,有助于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实态,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研究科举文学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图景,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容,拓展“科举学”的空间。

2005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都有30多部,发表科举研究论文400篇以上,每年以科举研究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10篇左右,硕士学位论文有30余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自2005年中国科举百年祭之后,新世纪中国“科举学”正在开展六大工程: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主持的《清史·科举志》、教育部考试中心杨学为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科举图录》、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主编的《科举学丛书》(包含科举学译著)、天一阁整理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这些工作量巨大的计划都已启动或获得进展,陆续完成后,必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科举学研究,推动“科举学”成为21世纪的显学。

现有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可谓不多,海内外用各种文字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有400部左右,专文有8000篇以上,但还是与科举本身的重要性和资料的广博性不相称,还有许多空白领域尚待填补,还有大量的文献和数据从未被利用过。举例来说,仅从历史上著名文学家的科举生涯和科举观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数千篇论文,已发表的个案研究论文如《陈亮与科举》、《吴敬梓的科举观》等虽也不少,但只占著名科举人物总数的很小部分。当改变过去片面的科举认识以后,科举文献中有许多是可以变废为宝的部分,例如流传下来的八股文,大部分仍处于原生态,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脱掉了“科举很坏”的有色眼镜,可以看到科举文学其实不全是灰黑色,而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和学术领域。例如,若不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解读,通读《儒林外史》全书之后可以看出,该书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完全否定科举制度,吴敬梓在书中批判一些应试现象,也讽刺了一些死读八股的儒生,但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对整个科举制度并没有持否定态度,并不是一部反科举的文学作品,最后一回“幽榜”的内容实际上是《儒林外史》的有机构成部分,不应将其强行删去。又如,如果跳出单一的科举批判思维,不再将参加科举视为反面举动,就可以理解《红楼梦》中贾宝玉最后参加乡试中举,其实并非不可预料的结局,而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文学作品的必然结尾,与前80回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贾宝玉中举后再出家,或许比单纯出家有更深刻的意义。类似问题还有许多,面对同样的文学作品,一旦转换视角和眼光加以观照,往往可以发现新的东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举文学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学史必然再次重写。

在研究“科举学”的成果和学者中,历史学、文学、教育学是最多的三个方面军,文学方面的科举研究已成为“科举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成果层出不穷,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试帖诗以外,还关注科举制与《文选》学、与唐代进士行卷、唐诗及唐宋传奇、唐宋的韵图、唐宋律赋、元曲及明清小说等的相互关系,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家的科举生涯、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文学作品与科举的关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结、举子与青楼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现。至于对吴敬梓《儒林外史》、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名著与科举的关系,更是已发表了许多论文。而科举成语与科举故事、废除科举后学术教育体系的重建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科举文学的现代版本、当代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中的科举,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此外,韩国与越南历史上的科举文学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必将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注 释:

- ① 还有一些学者使用过科举文学的概念,如姜伯勤将敦煌社会史料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料分为科举制度史料、科举风俗文献、科举教育史料、“进士文学”或“科举文学”史料。参见姜伯勤:《敦煌文书的社会功能——兼论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 ② 戴丽霜认为,北宋以直言议论为文化精神,知识阶层又兼具经术、文章、政事等特质,社会形态又偏向通经致用、理性分析,凡此种种,都显示除了官场奏议之外,经术之士发挥儒学义理及经世治国大道理的方式,以策论一类文体最适宜。见戴丽霜:《北宋科举与文学之研究》,载《岭东学报》1997年第8期。

[参 考 文 献]

- [1] [韩]朴容大等:《增补文献备考》,汉城:东国文化社 1964 年版。
- [2] 陈伯海:《清人选唐试帖诗概说》,载《科举学论丛》2008 年第 1 辑,北京:线装书局 2008 年版。
- [3] 陈 飞:《唐代试策考述》,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 [4] 吴承学:《策问与对策——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载《新国学》第 1 卷,成都:巴蜀书社 1999 年版。
- [5] 丁心斋:《科名金针》,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版,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本。
- [6]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 [7] 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
- [8] 金圣叹:《金圣叹全集》第 3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9] 王政尧:《试论清代状元与状元戏》,载《清史论丛》第 4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3 年版。
- [10] 毛佩琦:《中国状元大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11] Barr, Allan. 1986. "Pu Songling and the Qing Examination System," *Late Imperial China* 7(1).
- [12] 刘 虹:《中国选士制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13]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14] [韩]李炳赫:《韩国科文研究》,载(韩国)《东洋学》1986 年第 16 辑。
- [15] 邝健行:《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与八股文》,台北:台湾书店 1999 年版。
- [16] 刘 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载《集美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 [17] 黄 强、孙书平:《宋代“论学”渊源述略》,载《扬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
- [18] 陈选公:《“状元策”论略——“官人文学”研究之一》,载《郑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
- [19] 黄 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载《文学遗产》1990 年第 2 期。
- [20] 王 建:《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 何坤翁)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Liu Haifeng

(Center for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literature examination based on its examinational contents and styles. Since the testing articles of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ll kinds of genre of literature thus had countless ties with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On one hand, studying literature from the Study of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is an extensive field, which can increase the depth and thicknes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creasingly abundant research fruits on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literature can also impel the study of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move towards prosperity.

Key words: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study of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Eight-part Essay; Exam Poem